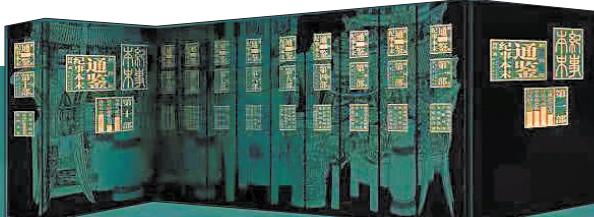


前不久,柏杨的遗孀张香华拒绝将柏杨著作《丑陋的中国人》摘文选入台湾一年级的语文教材,并正式向两岸出版商声明:“依柏杨生前交代,如今将永远停止发行《丑陋的中国人》。”东方出版社在《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完稿时隔20年后首次将此书以精装版的形式推出,柏杨的著作再次引发关注。为此,张香华接受了羊城晚报独家专访——



柏杨生前说：“中国进步了，就可以不要看这本书了”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中华文化之根

羊城晚报:柏杨一生著述颇丰,创作了小说、杂文、诗、报告文学、历史著作等计170余部作品,在日常生活中他的时间是否都一心扑在写作上?会帮忙做家务吗?

张香华:柏老确实没做过家务,有时太忙了,我们会请零工做。他平时事务繁忙,但是只要有灵感了,就一定要写文章。监狱的生涯让他非常珍惜时间。

羊城晚报:在他的著述中,历史著作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为何他倾心于历史著作?

张香华:一是兴趣,柏老本来喜欢历史,二是狱中十年,他并不能选择太多,要看图书馆里的书来打发时间。柏杨是1920年代生人,见证了中国的风风雨雨,他自己的一生也很坎坷,这让他感到当时中国人的品质需要提升,他想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这个问题要从历史中找答案。但是文言文不懂,他觉得他有让更多人看懂的责任。

人有寻找归属的情感,而历史就可以为我们提供这种归属。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根,没有根,没有归属感,轻则会怀疑人生的意义,在

羊城晚报:1983年,开始着手翻译《资治通鉴》的柏杨已六十四岁,待到《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千万字洋洋大观成,柏杨已然七十三岁,白发满头。他当时为何要用白话翻译《资治通鉴》,这部书的完成对他来说有何意义?

张香华:因为柏杨认为《通鉴》是一本好书。但是《资治通鉴》是用1000年前的古文撰写,很生涩难懂,更没有几个人愿意花费时间去看,所以着手翻译。过程确实很艰

辛,近千万字的工作要他一个人去做。从1983年开始,一共译了十年,期间未尝中断。《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直到2001年才完成。写作的时候,柏杨连晚上睡觉做梦都会梦见《资治通鉴》,经常在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中,忽然惊醒。可以说,在柏杨的作品里,《资治通鉴》系列的写作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付出辛苦最多,也是成就感最强的。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他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何种态度?为何在批

判的同时又为此倾注一生心血去梳理?

张香华:在柏杨看来,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绵长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人类能不能振衰起弊,和中国历史能不能创造新猷息息相关。但是,太久也会有问题,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的时间太长,我们善良的人民几千年过得很苦。柏杨写历史,是对传统历史不同角度的分析和批判,是为了锻炼自己诚实面对自己国家的历史。

拒绝将《丑陋的中国人》选入台湾教材

羊城晚报:您此前宣布,《丑陋的中国人》将于2024年停止发行。这是柏杨遗愿吗?

张香华:一本书的创作,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柏杨生前说:“当中国进步了,那就不要看这本书了。”中国人的性格正在逐渐成长,带着一颗健康的心,精神和肉体都在成长,不会再欺骗自己说:自己没有任何缺点,不再沉溺于过去的封闭、保守、做事不实在的毛病里。所以到了今天,我们就会有新的目标要追求,这本书就应该废掉。

羊城晚报:《丑陋的中国人》停止发行,是中国人不再“丑陋”或不那么“丑陋”了吗?

张香华: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矛头直指的是当时台湾的官

场,读这本书,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一定要有相应的历史知识储备。《丑陋的中国人》1985年在台湾出版,距今已经三十多年,当下的中国文明比三十年前已经进步了,比如其他国家都没有中国的扶贫工作做得这么好,还有自疫情以来,中国的防控力度和国人的配合程度,让我十分感动……所以,这本书现在就应该停止发行了。

羊城晚报:您拒绝将《丑陋的中国人》摘文选入台湾地区中学一年级的语文教材,为什么?

张香华:其实,自2016年以来,我一直持续收到教育出版社的类似邀请,都回绝了。如果柏杨在世,看到当下台湾年轻人渐渐被“去中国化”洗脑,抗拒两岸统一,他一定会非常生气!柏杨曾不止一次对我

说:“‘台独’之时就是统一之时。”在这样一个教育背景下,台湾的青少年在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即便读了柏杨的文章,又怎能领会柏杨的精神?势必会误读这本书。

羊城晚报:有人将柏杨的杂文跟鲁迅的杂文放在一起比较,也有人认为柏杨是继鲁迅之后“最伟大的杂文家”。他是如何评价鲁迅的?

张香华:柏老很喜欢鲁迅的小说,鲁迅是了不起的大作家,曾经在演讲时,有人问柏老,他是不是比鲁迅好,柏老说:“我觉得我出生在他后面,是站在鲁迅的肩膀上,当然会看得更远。”柏老并没有把他跟鲁迅做过比较。我认为鲁迅跟柏老都关心社会,有相同的地方。

“故乡”和乡愁书写仍然是世界文学的重要主题,文学中“故乡”与认同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具普遍性和症候性

从“乡关何处”到“建构故乡”

的话语再现的方式获得方向感、确定性和意义的建构行为。正是通过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建立连续性,通过尝试回答“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怎样再现自己?”等问题,乡愁书写的行程与认同的过程重叠、交叉起来。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现代华文文学中以乡土、怀乡为题材和主题的作品蔚为大观。在中国的现代早期(或者说全球化的初级阶段),从上个世纪的“乡土文学”到“京派文学”,“怀乡”作为主题一直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两大主题“革命”和“启蒙”并立,出现了鲁迅、废名、沈从文、萧红和师陀等代表性作家;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现代中期),“故乡”一度被具政治意味的“农村”所取代,“农民”(而非还乡者)成为文学书写的主人公,个体的乡愁隐而不显;八、九十年代以来(现代后期或所谓全球化时期),中国再次被全面纳入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潮流中,随着“寻根文学”的出场,以及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等大陆作家作品的出现,乡愁重新在当代文学中蔓延开来,并在新世纪有愈演愈烈之势。

肯定型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后来者有贾平凹、张炜、余光中等。肯定型认同虽然也是在现代二元性

的框架中生成,但它们不呈现为截然对立的关系。它的两个特点是:1、立足现在,肯定过去真实地发生过并对现在产生着影响,希望“过去”成为“未来”有价值的部分;2、把自己建立在过去、现在、将来连续性的维度上,追求自我的完整性。

想象型以李承平等为代表,后来者包括台湾的外省第二代及海外的一些华文作家。他们在童年记忆或者长辈回忆的基础上展开对故乡的想象与虚构,所以不受“写实”的约束。在他们的写作中,语言往往成为想象型并不明显偏重哪一方,而由想象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穿越。

反思型以鲁迅、萧红为代表,后来者有白先勇、莫言、刘震云、阎连科等。反思型源自现代性的二元对立——“城/乡”“中/西”“现代/传统”所引发的内在紧张。它有两个主要特点:1、反思既包括对故乡的“本真性、本真性”的反思,也包括对乡愁话语本身的反思;2、反思型虽然是“向过去的回眸”,却以“现在”为导向,体现出对“过去”的反思性和批判性。

肯定型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

多数人是把“乡愁”理解为一种情绪、情感或情结,将它与“怀旧”等同,而忽略了它作为一种现代中国文学话语,有面对“过去”却面向“未来”的建构性功能。作为时空变化与距离的产物,乡愁是人类普遍性、本真性的情感。尤其是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故乡”已成为原型意象,对故乡的表达——乡愁已深入到中国人的潜意识中,成为某种集体无意识,使得“还乡”成为生生不息的文化母题。到了“现代”,中国人对故乡的感受和体验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乡愁不再止于一种怀念性的情感抒发和叶落归根式的愿望表达,而成为现代个体通过语言表述寻求意义、表达自我、创建“家园”的话语建构活动。

“认同”,指的是透过某种文化

和理论框架与视界,个人和群体以

“乡关何处”或者说认同难题再一次成为我们时代文学和文化的焦点问题。近年来中国文学和文化中众多热点问题如“文化热”“国学与读经”、“童年的消逝”等都与这一问题有关。2012年,中国大陆乡愁书写的代表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一个信号,表明“故乡”和乡愁书写仍然是世界文学的重要主题,文学中“故乡”与认同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具普遍性和症候性。

乡愁认同最终指向的是一个情感和精神的“故乡”,这是一个基于真实故乡之上的理想化和升华后的“家园”。这个“家园”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应该是一个包容性而非排他性,无限性而非封闭性的“情感空间”和“意义空间”,类似鲍曼所说的“共同体”;(它)“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所以,与其说“故乡”是被“发现”的,不如说是想象和创建的,与其说是“回到故乡”,不如说是“建构故乡”,与其说是“回归家园”,不如说是“创造家园”。这样看来,乡愁认同的过程就是一个从故乡到“故乡”,从家乡到“家园”的创造过程。

探索建构新的商业模式是报业在数字时代自我拯救的关键要素

“望远镜”的酣畅感与“显微镜”的透视感

□张志安

辜晓进是资深媒体人、新闻实务教学专家、中美报业转型的观察家,他的《走遍美国大报》《重走美国大报》系列著作曾获中国新闻史学会“卓越学术奖”,体现他从资深媒体人向优秀学者的成功转型,也可见他对报业转型持续不断的观察。

最近,辜晓进又出版了新著《危机与变局:中美报业转型比较研究》。在这本书中,他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运用案例分析、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多种方法,结合大量一手调研资料,深度细致地剖析中美报业转型的异同。他对中美报业长期的贴近观察和深刻洞察,体现在一系列富有洞察性的观点中。

从融合转型过程看,中美报业经历的融合发展阶段有同有异。中国报业大致经历了报纸创办网站和电子版、报纸内容数字化与手机报、报纸与社交媒体及移动智能终端融合三个阶段,美国报业基本未经历手机报阶段。从起跑线的角度看,中美报业的数字化融合转型存在“时间差”。美国报业早在互联网诞生并商用化前,报业经济还处于强盛期和快速增长期时就开始进行多种尝试,而中国报业的“触电”则始于互联网商用化之后,而且初期主要是电子报等比较单一的形式,进入21世纪后两国报业的发展才逐渐趋同,他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报业危机意识和融合意识的觉醒,比美国同行晚了约15年。”

辜晓进调研显示,尽管国内报业的主要流基本认可“数字优先”这一战略,一批“中央厨房”的建立也表明从理念到实践的转变,“但真正常态化践行这一理念者,仍是少数。大多数报纸仍未脱离以纸媒为中心的生产流程”。从客户端运行角度看,中美报业的应用场景和传播效果有所不同,中国报业客户端的内容强调集团内不同报刊内容的聚合,收入和盈利方式不像美国报业那么多样化。两国报业都强调扩大数字平台的受众规模、开发和拓展数字端广告、在发行和广告之外开辟第三种收入来源。但中美相比,“第一点在扩大受众规模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内容收费方面中美差异巨大;第二点是美强中弱,第三点是各有千秋”。辜晓进还强调,探索建构新的商业模式是报业在数字时代自我拯救的关键要素。其中,付费墙在美国报业逐渐普及,在中国,则只有少数报纸真正持续探索。

纵观全书,读者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层面全面细致地把握中美报业融合转型的轨迹、趋势和挑战,既可以获得结构性层面“望远镜”的酣畅感,又可以感受到细节、案例和数据层面“显微镜”的透视感。

作为中美报业比较研究的一部力作,本书从始至终贯穿着观察视野的跨文化思维、现象剖析的在地性立场。掩卷沉思,辜晓进针对中美报业的深入分析,给正在深探前行的从业者带来启示:保持危机意识,坚守专业使命,大胆实验探索,报业融合转型这份考卷没有标准答案。同样,这本书也给诸多数字新闻业的研究者带来启示:保持政治经济学的整体视野,立足国家和社会的具体语境,以在地经验的厚重描述为基础,去建立国际对话的理论阐述,应是共同的努力方向。

显然作者是站在仿生人这一边的,希望他们摆脱奴性的驯化,去觉醒,去进化,去成为更好的生命

将思考嵌入精彩故事中

□郑然

杜梨的《孤山骑士》是一部包含众多主题和元素的科幻小说,有爱情、复仇、主人公的成长等众多类型小说的标志。一般提起类型小说,总会联想起通俗读物,虽然精彩却缺失深刻思考的故事,其实类型小说是最难写的,它对编故事的基本功有着非常高的要求。技术上稍不注意,一块上好的钢坯就开裂作废,要回炉重造。

《孤山骑士》与一般类型小说不同,作者在讲好一个精彩故事的同时,又将对社会现象的思考和对人性永恒的观察嵌入故事中。作者将大结构分为三块:“驯化”“实验”和“游戏”,这三个标题又包含了她一直感兴趣且不断深化思考的写作主题,通过主人公陆咪貉卧底财阀资本公司完成替仿生人爱人和父亲复仇,主题逐一推动展现。

这是一部拥有纯正赛博朋克血统的科幻小说,开篇主人公陆咪貉的陪伴仿生人菊地联合老谋深算型仿生人管家费尔曼,替女主人教训她的渣男男友。而这一行为却触犯了仿生人规定——仿生人不得对人类做出伤害行为,否则就会被回收拆解。在“驯化”这一部分,作者塑造了一个立体的仿生人形象菊地。

女主人公陆咪貉在小说中的行为驱动都来自情感,两股情感驱动她对抗这个世界阴暗的秘密,一是爱情(为了自己的仿生爱人菊地扭转这个社会对仿生人的不公待遇),二是亲情(替父亲陆一洋沉冤昭雪,向星浪公司复仇)。这两种情感,也塑造了陆咪貉的成长。而在第二部“实验”中,我们找到了答案。显然作者是站在仿生人这一边的,希望他们摆脱奴性的驯化,去觉醒,去进化,去成为更好的生命。

最终的大反派,作者塑造了一个拥有分身的女性角色,这不得不说是作者使用的一种反讽,也映射了女主人公陆咪貉体内的一对双子:一部分仿生人的陆咪貉,一部分作为人类的陆咪貉。这种作者对自我内部矛盾的泛化内省,在结尾处达到了高潮,也提升了小说的品质,令人拍案叫绝。“游戏”也可看做是作者对语言的一种炫技,呈现出一种生命力和末日夹杂在一起的美感。



“乡愁”与“认同”

多数人是把“乡愁”理解为一种情绪、情感或情结,将它与“怀旧”等同,而忽略了它作为一种现代中国文学话语,有面对“过去”却面向“未来”的建构性功能。作为时空变化与距离的产物,乡愁是人类普遍性、本真性的情感。尤其是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故乡”已成为原型意象,对故乡的表达——乡愁已深入到中国人的潜意识中,成为某种集体无意识,使得“还乡”成为生生不息的文化母题。到了“现代”,中国人对故乡的感受和体验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乡愁不再止于一种怀念性的情感抒发和叶落归根式的愿望表达,而成为现代个体通过语言表述寻求意义、表达自我、创建“家园”的话语建构活动。

“认同”,指的是透过某种文化

